

建专制思想和大国主义的立场，对当时其它国家、地区的来华使节，往往象对待少数民族使臣一样，视为“夷使”、“进献使”、“朝贡使”，其实，这些所谓“夷使”、“进献使”、“朝贡使”，皆是其国家和地区的正宗代表，是成色十足的使节。如日本的“遣唐使”，赴唐时，不仅带有“国信物”，且送行仪式也极为壮观。其它国家、地区的使节，也携有类别不同的“国书”、“国信”。

“使节”演至今天，已有两层涵义。它既指常驻他国的外交官，也指由一国派往他国临时办理有关事物的代表。前者始于近代，后者则是古代外交使节长期演变的结果。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，各国间交往的加强，国与国之间人们友好往来的日益频繁，“使节”一词将赋予新的含义，它将成为对世界各国友好使者的一种尊称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

实地考察古书中几个地理问题的驳正

杜泽逊

地理问题是我们学习古代文献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在经、史、子、集及其注释中，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材料。但是古人无论是著书还是注释都喜欢考之旧典，实地考察不够，造成不少以讹传讹现象，所以清代顾祖禹感叹“见闻与传闻异辞者之不可胜数”。我在实地观察中发现了不少这样的错误，今举《汉书》颜注、《通鉴》胡注、《文选》李注为例，略加辩证，以就教于方家。

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：“（相如）尝从上至长杨猎……，还过宜春宫，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。”

颜师古注：“宜春，本秦之离宫，胡亥于此为阎乐所杀，故感其处而哀之。”

我认为师古这一注释是错误的。

（一）关于二世的死，最早记载的大约是汉初贾谊，他在《新书·胎教篇》中说：“二世以劫于望夷之宫。”二世死于公元前二〇七年，贾谊生活于公元前二〇一至公元前一六九年，贾谊十八岁通诗书，以文章显于郡，二十余岁就做了博士，其时去二世之死才二十几年，可谓去古未远。贾谊纵论秦之得失，有《过秦论》，于秦之旧事最熟。

（二）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对赵高谋害二世的史实有详细记述，俱见《始皇本纪》、《李斯列传》之中，明言二世死于望夷之宫。司马迁生于约公元前一四五年，他生活的时代去二世之死也不远，可以想象，当时秦朝故事一定还在社会上广为流传，司马迁利用旧籍与传闻两手材料写成《史记》，若有二世死于宜春宫之说，何不见载？

（三）刘向校理群书、博通经史，他在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二书中都主张二世死于望夷之宫，详见《说苑·尊贤》、《新序·杂事五》。向为通儒，若有二世死于宜春之说，何以只字不提？

（四）《大戴礼记》所收文章皆成于公元之前，其《保傅篇》多承《贾子新书》之说。亦可见二世死于望夷，实乃西汉众所共知之事。

又，东汉王符《潜夫论》、陈琳《为袁绍檄豫州》、魏曹叅《六代论》并同西汉之说。即使师古之后的唐代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亦明言二世死于望夷之宫。颜师古之说既未言明所据，

又不见于他书的记载，所以是很值得怀疑的。

那么望夷宫与宜春宫是否为一地呢？考察证明二地相去甚远，决非一地。《史记集解》引张晏曰：“望夷宫在长陵西北，长平观道东故亭处是也。”《文选》注引张华说与此相同。李吉甫云“在（泾阳）县东南八里”。今望夷遗址尚存，在陕西省泾阳县东南，与以上记载相符。而宜春宫居长安东南，遗址在今曲江乡春临村，向无异议。可见二地相去远矣。

据实地考察与《史记》记载，相如作赋实因二世葬于宜春苑。《始皇本纪》明言“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”，宜春苑即唐之曲江池，今遗址亦存，宜春宫即苑中之宫，旧说亦无异议。而二世之墓就在曲江池南岸。今二世墓封土圆形，直径约二十五米，高约五米，北侧有清陕西巡抚毕沅所立之碑，碑面阴刻“秦二世皇帝陵”六个隶书大字，是为二世之墓无疑。又观相如赋中有云：“坟墓芜秽而不修兮，魂无归而不食。”则相如作赋之因显而易见，因此张守节主张“经宜春宫，见二世陵，故作赋以哀之也”。才是完全正确的。

通过以上探讨，我认为秦二世被逼死望夷宫、葬于宜春苑、司马相如凭陵而吊，遂发千古之幽情这一说法可信，而颜师古的说法是不对的。观《汉书》颜注，凡对前人有匡正处，师古多有辩证，而此条注释全无驳难之辞，疑师古全凭记忆、未加深考，故致此误。

二

《资治通鉴》卷八：“乃立子婴为秦王，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。”

胡三省注：“宜春苑在杜县南，汉立宜春观于此地。”

经考，汉宜春观与宜春苑虽同用“宜春”之名，实非一地，胡注误。

问题的关键在于宜春观的位置。晋潘岳《关中记》云：汉宜春观在扶风。（见《长安志》引）扶风与京兆、冯翊为汉“三辅”，而汉宜春苑在京兆杜陵附近，据此知二地一在扶风，一在京兆。

再看《水经注》，其卷九云：涝水“北经汉宜春观，又东北经鄠县故城西……，合泔陂水，水出宜春观北……，北流入于渭。”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鄠县在扶风辖内，知《水经注》所谓汉宜春观正是潘岳《关中记》所谓汉宜春观，其地在扶风鄠县，处涝泔二水之旁。而宜春苑在长安东南。

因此，汉宜春观在宜春苑西，二地相去约百里，绝非一地。这一问题虽经唐之颜师古（《汉书》注）、宋之程大昌（《雍录》）、王应麟（《玉海》）先后辩证，但胡氏面对这些材料，因无实察经验，仍没弄清宜春观、宜春苑、宜春宫三者的实际关系，而把它们混为一谈。

三

《文选·张衡西京赋》：“其前则终南太一。”

李善注：“《五经要义》^①云，太一名终南，在扶风武功县。”

经观察考证，长安附近实有两座太一山，前人治“选学”者众矣，然未有言及此者。

其一为武功之太白山，古代叫太一山（一，亦作壹，又作乙，同。），即《五经要义》所云“扶风武功县”者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扶风武功县有“太一山，古文以为终南”。这是武功太一山的最早记载，《水经注》云，（太一山）“在武功县南，去长安二百里”，《初学记》卷五引辛氏《三秦记》云：“其山从长安向西可二百里。”这又是对《汉书》的进一步补充，据此知武功太一山在长安西二百里。通过实察，其山在今陕西郿县南二十公里，海拔四千余米，为秦岭山脉主峰之一，乃

关中第一高峰。《水经注》引杜彦达曰：“太白山南连武功山，於诸山最为秀杰，冬夏积雪，望之皓然。”这正是称“太白山”的原因。

另一座为长安县之翠华山，在今西安市南四十多公里处，为终南支峰。

唐李吉甫在元和间“核关中终南山所历而著诸郡县……，则太白专属县境（此指郿县），太乙专属万年。”（清《郿县志》）万年县清代并入长安县。据李吉甫的意见，武功太一之外又有一太一山，其山当在今长安县。《汉宫阙名》曰“长安有太乙宫。”（《太平御览·居处部》引）《长安志》则云：“万年县，太一观在县南六十里终南山炭谷口。”《雍录》作“太一祠”，其实一也。今长安县有太乙宫乡，其乡附近有太一真人庙，自此入谷十五里即为翠华山，其山又叫太乙山，当即李吉甫“专属万年县”者。

乾隆《西安府志》引何景明《雍大记》云：“五台山太乙谷中有太一元君湫池，汉武帝元封二年祀太一于此，建太乙宫。”贾汉复《陕西通志》亦云“太乙宫在西安城南五十里太乙山谷中，汉元封初，南山谷间云气融结，武帝于此建宫。”未知其根据，但其说大抵可信。言“太乙”者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皆有，但各有其独特的意义范畴，与天神无关。只有在汉武帝时才接受方士的建议把太一作天神祭祀，认为“天神贵者太一，太一佐曰五帝”（《汉书·郊祀志》）。而且这种祭祀活动相当多，俱见《汉书·郊祀志、武帝纪》之中。但这种活动到后汉就很少了，《后汉书》无言太一神者即其明证。因此我认为太乙宫建于武帝时之说不无道理，而“太一山”之得名亦当在两汉之间，只是此山并不高大，故不如武功太一山出名而已。

我去翠华山，见《翠华山简介》引述王维《终南山》诗，《西安旅游指南》及《中国名胜辞典》也把王维这首诗定为咏翠

华山之作，我认为值得商榷。王诗云：“太乙近天都，连山到海隅，白云回望合，青霭入看无，分野中峰变，阴阳众壑殊……。”显然主要写山的高，武功太一山为关中第一高峰，“於诸山最为秀杰”。因此我认为把王维这首诗定为咏武功太一山更合适一些^②。清代赵殿成《王右丞集笺注》正持这种看法。唐代诗人李白有《登太白山》诗云：“西上太白峰，夕阳穷攀登。”又云“一别武功去，何时复见还”是亦为武功太一山无疑。而张衡《西京赋》云“其前则终南太一。”其方向与李白“西上”云云应当有别，因此我认为把《西京赋》所说的“太一”定为翠华山更合适一些，因其山恰在汉长安之南，而武功之太乙山却在长安之西。李注恐误。

明确太一山有两座，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前人有关太一山的创作，无疑是有帮助的。

注：

①《五经要义》见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晋人作。

②太白山也是终南山的一部分，故《汉书地理志》云“太一山古文以为终南”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

关于“角 笔”

吕朋林编译

在日本平安朝文学作品《篁物语》中，说到小野篁（802—852，曾任遣唐副使）写过一封情书。那封情书是用“かくひち